



文学作品中的“非遗”(之一)

以文学叙事传承民族文化

——浅论《桦皮船》中的“非遗”与少数民族物象

□ 毕海

薛涛的《桦皮船》围绕东北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桦树皮船制作技艺展开,讲述了少年乌日与民族文化传统相遇的故事。作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在叙事上的独特之处,是擅长表现儿童的出行和冒险,表现一种成长中的历练。这构成了薛涛儿童文学写作独有的“远行”和“宏阔”。在《桦皮船》中,薛涛再次运用其得心应手的“返乡-远行”叙事,以儿童的视角和感觉,深入民族文化的肌理,擦亮“故乡-山林”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但与以往的小说创作不同,《桦皮船》以全新的当代在地视野,提出了“以文学叙事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命题。

发现“非遗”和民族文化背后的深厚意涵

薛涛热爱北方的桦树林,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着对桦树的刻画。有研究者曾指出,薛涛小说中不时出现“林子”和“地平线”的意象,“总有一棵或一片白桦林,那种刷白细长的优雅树体,令人想到某种同样优雅的存在姿态”。(参见方卫平、赵霞:《远行精神与家园意识——薛涛少年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2期)如果说,对森林、远方的书写构成薛涛写作的一种基本母题,那么创作“桦皮船”故事则是他一直难以割舍的某种执念。薛涛熟悉和推崇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对精心收藏的桦皮船爱不释手。《桦皮船》中的主人公乌日,“虽是鄂伦春人的后代,但他也生活在城市里,还没进过老林子”。乘坐桦皮船,归赴呼玛河山林,小说是在展现一种交通工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产,更是在表现与“非遗”相连的生活方式、精神向度和文明形态。借由“在路上”的“返乡之旅”,城市少年乌日和读者一起重新发现了自然、故乡和民族文化,并通过爷爷托布道出了“非遗”和民族文化背后的深厚意涵。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托布在城市的尴尬处境也恰恰隐喻和投射出“非遗”传承所遭遇的某种现实困境。小说写道:“在沈阳,托布是一匹老马,步履蹒跚地熬日子。一下火车走进森林,托布就变成一头活力四射的鹿。现在托布回到河中,又变成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这是在说猎人莫日根·托布,又何尝不是指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桦皮船美观、奇特,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兴趣,一度让乌日和班长李敬仪一样,得到了关注甚至嫉妒的眼神。但桦皮船终究在城市无用武之地。这也就难怪乌日的父亲“对桦皮船打起了歪主意”,想搬到“老东北饭庄”大堂去招揽顾客。商业化的展览正是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遭遇的普遍性命运,但在小说《桦皮船》中,作者让桦皮船和城市少年乌日回到山林,回到呼玛河,回到生活实践,“复活”了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

揭示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现实路径

《桦皮船》以缤纷绚丽的少数民族物象浸润童年,在当代性和儿童性的视域中表现成长,鲜活生动地揭示了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现实路径。乌日是鄂伦春族人,但他出生在沈阳,每天是“写不完”的作业,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所知甚少。与爷爷的“相遇”和“返乡”,以及小说反复出现的少数民族物象和意象,包括乌日不熟悉的鄂伦春语词,和东北市镇乡村的物产和民风习俗,都不再是空洞的缺乏意义的符号,而是浸润其间真切民族文化生活。小男孩乌日对爷爷和民族文化的认识,要从学习鄂伦春词汇和物象开始,“查勒巴毛”“尼查”和“木罗贝”对应着白桦树、柳根鱼和桦皮船,托布的梦想能编一部少数民族生活物象词典。乘坐K38次列车,从沈阳出发,驶过铁岭、昌图、四平、公主岭、范家屯、白城、富裕,到大杨树、塔河,自南向

北,沿着一条铁路线横跨广袤的中国东北城镇。乌日、爷爷和李阿哈在沼泽的遇险,托布和满江赌鸟,乌日和棕熊偶遇,神秘而神奇的柳根鱼王,老马“红9”和破旧的撮罗子,家犬“铁锤”与小孢子“古然”对峙的相爱相杀……《桦皮船》对北中国地貌、植物、动物、语言、民俗、地方风情、生活情态等内容的细致勾勒和精心描摹,以及有关东北少数民族物象的博物学式的叙述,既是在写儿童故事,更是以幽默的方式“写心灵悸动与万物之美”,重新擦拭出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内涵和迷人魅力,让孩子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和“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多民族文化生活有更加感性深切的认知。

《桦皮船》以儿童文学审美叙事方式展开对“非遗”保护传承及文化多样性的表述和思考,为民族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启示意义。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需要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这在新时代已然成为共识,但具体应该怎样传承、如何创新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前新媒体、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或依赖商业化、产业化的推广甚嚣尘上。然则,形式固然重要,但语言、审美、物象、情感等内容的选取、激活、编织和形塑,才是民族文化传统传承赓续成败的关键。近年来,《桦皮船》《神授·魔岭记》《本巴》等当代中国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再书写,体现出作家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创新性发展的持续思考。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审美赋形无疑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根基和有效形态。《桦皮船》不同于以往民族文化书写常见的“奇观式”展示,借由“桦皮船”的“返乡”、乌日的“远行”,从城市到边地,以儿童成长叙事的方式,将学术界关切的“非遗”“民族文化”之价值、魅力,以及保护传承与文学的城乡差异、代际矛盾、守旧革新等现实主题,较为妥帖地结合起来,充分显示出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复杂深沉的文化思考,为文学创作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探索性的实践。

引领儿童精神成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新时代儿童文学需要厚植民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民族文化主题表达只有在童心童趣的文学性的基础上,展开及物的当代性现实主义生活书写,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赓续、传承和创新,增强文化自信。以文学审美和成长叙事探寻民族文化传承的创新性发展,通过对“非遗”、民族文化物象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书写确立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性形态,是《桦皮船》给予新时代民族文化表达的双重思考和意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民族神话传说故事绘本研究”(21BZ0182)、中央民族大学科研专项项目“多民族文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内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桦皮船》,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3月

《桦皮船》(选摘)

□ 薛涛

巷子里是一排又一排的红砖房。红砖房是多年前政府专门给下山的鄂伦春人建的,比山顶的撮罗子住着暖和。托布却不太习惯,说红砖房里闻不到木头的味道,睡不着觉。豆腐匠认为师父矫情,可是没人能撼动他的执念。于是,巷子东侧便诞生了一座木屋,四周围着木栅栏,非常惹人注目。托布就住在这座木屋里。木屋距离呼玛河更近一些,再往东还有一片桦树林。托布把他的“船作坊”安放在桦树林中间,这样干起活来特别起劲。进入夏天,托布带着豆腐匠进林子刮桦树皮,只有那些百年老树的树皮才合格。托布还需要准备一种辅料——木筋条。木筋条托布只用樟子松的,连落叶松的都不行。每到制作桦皮船的日子,豆腐匠就得丢下家里的豆腐坊,天天来桦树林跟着师父。组船身、起船头、固定船体、晾晒……每道工序都有门道,一边跟着师父学,一边帮着师父做。可是师父严苛,剥的树皮厚了、薄了都不行。剥厚了,树就活不成了;薄了,船身不结实。等到正式造船时,师父更不好侍候,不是嫌木筋条削得不均匀,就是怪篝火生得不够旺,树皮烤得不够软。有一次,他不小心毁坏了一张树皮,就被师父赶走,三天后才让他回来。豆腐匠得意地说,师父造的桦皮船大受欢迎,有的被私人珍藏,有的摆进博物馆。有一年,一条桦皮船还摆进了上海世博会。师父常说的一句话却是:“我造的船应该回到河里,呼玛河才是桦皮船的家。”托布造船的时候,红9在林子吃草、溜达。阿哈会主动管理红9,提醒它不要走太远,太远了主人不放心。红9才不理睬阿哈,继续自由自在地闲逛。托布干活干累了,便牵着红9到河边望着对岸的岭。红9安静了,阿哈也安静了。它们也知道岭上是从前的家。



《桦皮船》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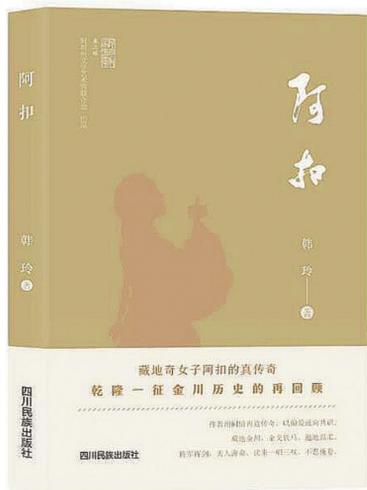
链接

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桦皮船是原始狩猎时期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族夏季渔猎生产、生活的必备交通工具。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是我国东北桦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鄂伦春族世代相承的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居住在塔河十八站的郭宝林是这个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郭宝林自幼跟随父亲郭阔开学习传统手工制作桦树皮船技艺,手工技法精湛,凭借着丰厚的民间学识和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独特的造船风格,他制作的桦树皮船受到当地鄂伦春族老年人的广泛好评和认可。郭宝林用自己的行动传承着鄂伦春人最根深蒂固的狩猎文化。《桦皮船》这部作品就是以郭宝林等执着守护兴安岭自然与人文资源的人们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一场历史重塑中的文学旅行

——评韩玲长篇小说《阿扣》

□ 白浩



《阿扣》,韩玲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4月

韩玲长篇小说《阿扣》讲述了藏地传奇人物“玉观音”阿扣的故事,专注于清末大小金川之战中土司女儿阿扣在权力游戏和追求爱情间的颠簸人生,在大历史的波峰与波谷之间重述一个被巨浪冲击的小小个体命运,力图书写东女国女儿的健朗人性之歌。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内部暗含着三重文本叙述张力。

第一重文本是阿扣的主线故事。叙述按照历史逻辑展开,作者致力于让读者相信她讲述的故事就是真正的历史真实。但实际上,故事讲述之下隐藏着自我叙述主体,主线实则为重述历史,是个体主观的历史演义,也是关于特定历史的当代性、个人化讲述。第二重文本是寻访历史时“我”之行迹的片段插话,在作品中用楷体字标出,与文末《后记》作者自述互相参照,作者在寻访历史之旅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感怀慨叹是按照现实生活逻辑进行推演的,也是散文化写作特点的直接体现。第三重文本可以在小说后记中读到,即史料记录《金川妖姬志》。在《金川妖姬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语

境中对女性的“妖姬化”塑造偏好,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等,不妖其身必妖其人,类似表述很多。这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逻辑,即女人阿扣在权力游戏中被多方势力摆布,以至于成为牺牲品,重视这部分材料可以发掘作品的文化深度与思辨性。

一方面,历史与现实两重文本之间相得益彰,跨越时空的两个女性进行对话和情感交流,让探访历史的真实性得以强化,也让小说叙述变得更有温度、有个性。另一方面,这种写法打破了虚构性小说叙述的单一逻辑,激发了读者自主判断、破译历史的可能,引发读者思考为何作者会对阿扣的故事充满不平之气,进而探寻究竟何为历史的真相。三重文本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叙述立场,综合起来看,展现出的历史真相也在抵牾与参差中变得更加复杂而强大。我认为,韩玲的小说《阿扣》具有一个强大的对话潜文本,正是在这种对“妖姬”到饱满鲜活的女性形象的转化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借历史人物直抒胸臆的叙述勇气。

小说《阿扣》是一次在历史的虚构和重塑中的旅行。反观其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杨扎西的春天》,尽管是主题写作,但作者始终保持着从情感到事件描述的中性立场,既有有分寸的热情,也保持着局外人的节制和冷静;既有对贫困户的关心和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并不讳言客观存在的距离感,甚至委婉地表达了对下派干部所面临的客观压力的担心。显然,她并不盲目随大流地进行传声筒式的文学表达,这体现了作者对于生活逻辑的尊重态度。她的小说力求客观真实,不夸大、不溢美,表达着对于现实社会人物的同情和对历史文化的深沉思考,让人想起了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风格。在《康家地》后记中,作者自述里写着:“我大抵也受了此(高原小城环境)影响,生活得百折不挠。又或者是骨子里遗传了东女国女子的骄傲与好强,表面上水波不兴,内心里却是千回百转。”小说《阿扣》正是将这两者结合的一个典型文本,要破解其中奥秘,也需要将“表面上的客观冷静”和实质内心的强烈主体投入相融合、相对照起来看,以期呈现出一种更为丰富深邃、更为真实的阅读体验。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超脱苦难 疗愈自己 救赎他人

——读潘灵中篇小说《星星索》

□ 徐霞



不仅选择了原谅,还默默地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对方,从中可见那颗博大与包容的心。重诺是虞素的第三重精神品质,为了林江平能在公社与学校少受一些处罚,她不惧“被白鹤镇人戳脊梁骨的压力”,信守与黄廷波的约定,每日上门替他朗读文学名著;“文学让冷硬如钢铁的他,逐渐变得温暖而柔软。在虞素近两年的朗读中,黄廷波完成了对自己的重塑。”虞素以自己守信重诺的美好品质,救赎了这位“凶神恶煞”的小镇青年,让他得以疗愈生命的困境。悲悯是虞素的第四重也是最闪光的精神品质,虞素用自己积攒下的钱安葬黄廷波的情节,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在小说中,潘灵也试图追问是什么造就了虞素傲然挺立的精神世界,她身上的诸多美好品质究竟缘何而来?读罢小说,答案是柔和悠扬的《星星索》,是父亲赠与虞素的《简·爱》《悲惨世界》,是她借给黄廷波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为他朗读的《苔丝》……简言之,是文学一直以来对虞素内心的滋润,无形中帮她筑起强大的精神宇宙,让她拥有了健全而坚韧的人格,从而让她从现实的苦难中超越出来,疗愈自己也救赎他人的身心之困。

在塑造虞素这位女性形象的同时,潘灵用林江平的懦弱、杨成林的无耻、黄廷波的野蛮等作为对比,他们被时代语境和物质环境所困,精神上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但潘灵对这些人物大多寄予希望,只要环境改变,他们的世界也可能被文明之光点亮。林江平、黄廷波皆是如此。虞素离开了白鹤镇小镇,然而直到晚年,她依然保持着优雅而高贵的风度和气质,这一形象在具有悲剧感的现实境遇里,显示出一种质朴的人格魅力。作者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内部,对人性作出细致描摹,探索人类精神家园重建的可能、路径与限度。由此,我们可以说《星星索》是一次具有深层回望意味的写作尝试。(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一个女人,在特殊年代落入野性之乡,陷入粗鄙与野蛮的包围之中,她试图用爱去点亮人们的精神之光,用文明去照亮黑暗。美是不可征服的,精神的力量异常顽强,一首《星星索》成为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象征。潘灵发表于《芙蓉》2023年第3期的中篇小说《星星索》为我们打开了文明与野蛮冲突的一扇大门,透视出一个优雅女人的心灵世界。《星星索》以“我”的视角,讲述了一段白鹤镇的陈年往事。印尼归国华侨虞素,年轻时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后被分配到白鹤镇新华书店做售书员。在排练中秋晚会节目时,她结识了“我”的三叔林江平,一位相貌英俊的音乐老师。虞素提出在晚上用印尼语演唱一首爱情歌曲《星星索》,在爱情尚是禁词的年代,林江平对此充满担忧,但考虑到现场几乎无人能听懂印尼语就答应了。当晚,她才女貌的演出非常成功,婉转动人的《星星索》在白鹤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虞素与三叔也萌发了爱情。然而一次醉酒失言,林江平将《星星索》是爱情歌曲的秘密吐露了出来,两人的行为犹如一颗惊雷在白鹤镇激起了千层浪。很快,公社广播站便播报了对虞素的检举信,而举报人正是“我”的三叔林江平。在潘灵从容的叙述中,虞素与林江平、黄廷波、杨成林等人的命运纠葛缓缓上演……小说最后,历经伤痛的虞素离开白鹤镇。

《星星索》读起来很畅快,不仅在于情节的跌宕起伏,更得益于主人公虞素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让我们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性及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虞素是引领人侧目的外貌:“皱纹不仅没有绞杀掉她姣好的面容,还给她增添了历尽沧桑却又超凡脱俗的气质。一个拥有气质的老太太,那种美仿佛是从骨子里渗出的,惊心动魄又咄咄逼人。”小说开篇,作家通过“我”观望广场舞人群中的人群中的虞素吸引,来表现这位女性虽已迟暮却依旧气质不凡。

除了出众的容貌以外,作者在虞素身上还寄托了高远的人性理想。独立是虞素最鲜明的精神品格:“她没有朋友,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她已习惯自己像一株孤独的花,静静地长在草丛中。”虞素身上有一股让人敬佩的骄傲与倔强,面对命运二连三的打击,仍然展现出鲜明的个体意识。绝境之中同杨成林结婚,是她自己决定的,离婚时仍掷地有声地说出“这是决定,也是我的权利”。在特殊年代,她始终保持着人的独立与尊严。宽容是她的第二重精神气度,虞素后来命运的诸多不幸,发端都在于林江平对她的举报,但面对心爱之人的背叛与软弱,她